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 (2010)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 中国战略

林 岗 王一鸣 黄泰岩 马晓河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 (2010)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 中国战略

林 岗 王一鸣 黄泰岩 马晓河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林岗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8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 2010)
ISBN 978-7-5141-1055-5

I. ①迈… II. ①林…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改革-
研究报告-2010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641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周秀霞
责任校对: 王凡娥
版式设计: 齐 杰
技术编辑: 邱 天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

林 岗 王一鸣 黄泰岩 马晓河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710×1000 16 开 20.75 印张 370000 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1055-5 定价: 3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2010年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左右，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国正试图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创造30年快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中国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世界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可是在世界上近200个国家中真正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少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发展战略失误等各种原因，都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迟迟不能突破10000美元大关，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发展长期低迷，没有获得明显突破。这种现象被称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具有必然性。亚洲“四小”的现代化成功经验，虽然对我们具有借鉴价值，但发展条件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它们都是小国和地区，而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总人口还不到10亿，我国13.39亿人口的现代化，将需要世界巨大的市场和资源的支撑，这对世界经济版图的影响是巨大的。二是它们都受到美国的保护和支 持，而我们却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遏制下实现发展。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将难上加难。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指出：中国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

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别无选择，必须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世界奇迹。因此，我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国内有影响的“国家智库”，对这一关系到我国命运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2010年初的院务会上，就将该课题作为2010年研究院的研究重点，举全院之力、分工协作展开联合攻关。2010年12月，研究院又将完成的《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战略》研究报告初稿打印出来，召开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论坛（2010）”，请相关专家、学者们与作者一起就研究报告初稿进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这次研讨会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等报道了研究报告的主要思想和观点。研讨会后，研究院又组织写作组成员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系统的修改，最终形成这本研究报告呈现给读者。我们期望：通过本研究报告的推出，将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更渴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引领作用，最终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我国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做出思想和理论贡献。

本研究报告写作的具体分工是：王一鸣（第一章）、马晓河（第二章）、吴晓华（第三章）、陈甬军（第四章）、石明明（第五章）、王青云（第六章）、陈亮、杨静（第七章）、黄泰岩、黄锬（第八章）、宋立（第九章）、张杰（第十章）、毕吉耀（第十一章）、张培丽（第十二章）、刘树杰（第十三章）、张燕生（第十四章）、刘元春（第十五章）、赵净（附录）。

研究报告中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11年6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体战略	(1)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国际经验	(1)
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挑战	(7)
三、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	(14)
四、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条件	(17)
五、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23)
第二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	(29)
一、世界典型国家的经验教训	(29)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困境	(35)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困境	(41)
四、化解结构调整困境的思路	(44)
第三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城乡结构调整	(48)
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48)
二、城乡协调发展政策的基本内容和目标	(51)
三、我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成就、经验和问题	(55)
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	(64)
第四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城市化政策	(70)
一、中国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70)

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政策选择	(80)
第五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发展	(86)
一、金融发展与国家经济绩效	(86)
二、中长期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94)
三、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97)
第六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发展政策	(103)
一、地区差距的测度内容和方法	(103)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地区差距的调控目标	(105)
三、缩小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措施	(123)
第七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自主创新	(125)
一、迈过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 我国的挑战	(125)
二、促进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131)
三、我国自主创新的战略选择	(141)
第八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145)
一、收入分配对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一个文献综述	(145)
二、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增长的矛盾	(148)
三、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制度根源	(154)
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措施	(158)
第九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政策选择	(163)
一、消费需求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	(163)
二、提高消费增长率是扩大消费的理想指标	(171)
三、提高我国消费增长率的空间	(180)
四、提高我国消费率的措施和途径	(189)

第十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企业升级	(201)
一、企业升级的内涵及理论	(201)
二、企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	(205)
三、中国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升级挑战	(208)
四、企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214)
五、企业升级转型的战略选择	(218)
第十一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能源支撑	(220)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挑战	(220)
二、构建能源支撑体系的着力点	(224)
三、构建能源支撑体系的配套措施	(228)
第十二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水资源支撑	(232)
一、我国中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对水资源的需求	(232)
二、我国中长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水资源压力	(240)
三、构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水资源支撑体系	(245)
第十三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监管现代化	(249)
一、现代监管理论的基本框架	(249)
二、我国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256)
三、我国监管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259)
第十四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环境及其应对	(265)
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判断	(265)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	(267)
三、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根源	(269)
四、我国二元结构的贸易和生产体系	(271)
五、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思路	(274)
第十五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向	(282)
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拟测算	(282)

二、次高速增长时期的动态平衡术·····	(287)
附录 国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研究 ·····	(295)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295)
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现状·····	(296)
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297)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302)
五、结论·····	(305)
参考文献 ·····	(307)

第一章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总体战略

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必须及时对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作出战略思考，找到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国际经验^①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

^① 孙学工研究员为这部分提供了国际比较的数据和资料，特此致谢。

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2 年接近 3000 美元，到 1984 年突破 1 万美元。韩国 1987 年超过 3000 美元，1995 年达到了 11469 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 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671 美元，2006 年仍停留在 1123 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 198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812 美元，到 2008 年仅达到 8209 美元。阿根廷则在 1964 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 1000 美元，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 2008 年的 8236 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 10000 美元的门槛。

（二）经济社会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成功迈过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着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 1963 年至 2008 年的 45 年间，阿根廷有 16 年出现了负增长，马来西亚有 5 年出现负增长，而韩国仅有 2 年出现负增长。在这 45 年中，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 1.4%，马来西亚为 4.0%，而韩国为 6.3%。1963 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842 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 142 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 45 年后的 2008 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 8236 美元，仍为中高收入

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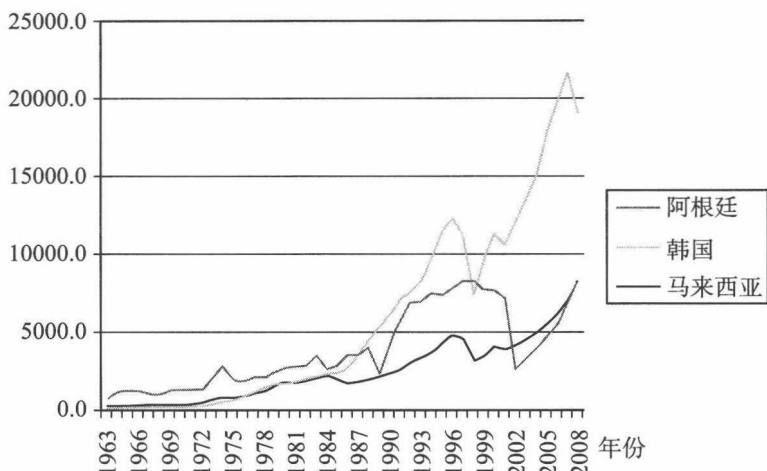


图 1-1 典型国家人均 GDP 的变化 (美元现价)

第二，需求结构差别不明显。从投资率看，韩国、马来西亚明显高于阿根廷。韩国、马来西亚在1990年达到高点时投资率分别为37.5%和32.4%，阿根廷1980年达到高点时仅为25.3%（见表1-1）。在投资率达到峰值后，韩国的回落幅度要明显小于马来西亚，而阿根廷的投资率始终较低。从消费率看，2000年阿根廷、韩国、马来西亚分别为84.5%、68.6%和58.2%，阿根廷较高，马来西亚较低，韩国居于两者之间。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方面，韩国也处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之间。以上情况表明，阿根廷的发展明显受到投资率低的影响，而马来西亚经济未能保持亚洲金融危机前的良好增长势头，也与其投资率特别是私人投资率下降有一定关系。

表 1-1 需求结构的变化 (%)

年份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7
消费	阿根廷	76.5	74.7	76.2	80.3	84.5	71.5
	韩国	98.1	84.8	76.1	63.6	68.6	69.1
	马来西亚	74.3	75.7	70.2	65.5	58.2	57.8

续表

年份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7
投资	阿根廷	23.5	24.4	25.3	14.0	16.2	24.2
	韩国	11.4	25.4	31.8	37.5	30.6	29.4
	马来西亚	13.8	20.2	27.4	32.4	26.9	21.9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阿根廷	0.0	0.9	-1.5	5.7	-0.7	4.3
	韩国	-9.5	-10.2	-7.9	-1.1	0.9	1.5
	马来西亚	11.9	4.1	2.4	2.1	15.0	20.3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第三，产业结构不存在明显差异。阿根廷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历了由高向低变动的过程，由1965年的48.4%上升到1975年的50.1%，再下降到2007年的33.7%，而马来西亚则从1965年的27.5%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47.7%，韩国则从1965年的20.2%上升到1995年的41.9%，2007年下降到37.1%（见表1-2）。目前，韩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介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之间。由此可见，工业比重高低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因素。

表1-2 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

年份	1965	1975	1985	1995	2007
阿根廷	48.4	50.1	39.3	28.0	33.7
韩国	20.2	29.3	39.1	41.9	37.1
马来西亚	27.5	34.0	38.5	41.4	47.7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第四，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第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五，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 0.45 左右，到 90 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 年阿根廷达到 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 的水平上。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基尼系数为 0.36，到 90 年代末下降到 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 10% 收入阶层和最低 10% 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 40.9%，马来西亚为 22.1%，均远高于韩国 7.8% 的水平。

第六，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 1960 年仅为 54.2 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 11 岁。到 2008 年，韩国提高到 79.8 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 75.3 岁和 74.4 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 1960 年婴儿死亡率高达 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 59.9‰和 66.1‰，到 2008 年，韩国已经下降到 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 14.6‰和 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 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 5.6 年上升到 11.3 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 8.9 年和 9.7 年。

第七，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 1990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 5.3%（见表 1-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 2002~2004 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 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表 1-3 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8
FDI 净流入占 GDP 的比重	阿根廷	0.9	1.0	1.3	2.2	3.7	3.0
	韩国	0.0	0.2	0.3	0.3	1.7	0.2
	马来西亚	3.7	2.2	5.3	4.7	4.0	3.3
外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	阿根廷	35.6	60.9	46.0	38.9	50.9	39.9
	马来西亚	27.5	68.6	36.4	40.6	48.6	35.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二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

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20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挑战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价计算超过4000美元，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

（一）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持续较快增

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见图1-2）。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67亿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1亿人。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到202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2.34亿人和1.64亿人。从我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的变化看，1982~2009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①从1982年的38.5%下降到2009年的27.0%，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同期储蓄率从1982年的33.5%上升到2009年的51.4%，上升了17.9个百分点，显示了抚养比与储蓄率的逆向变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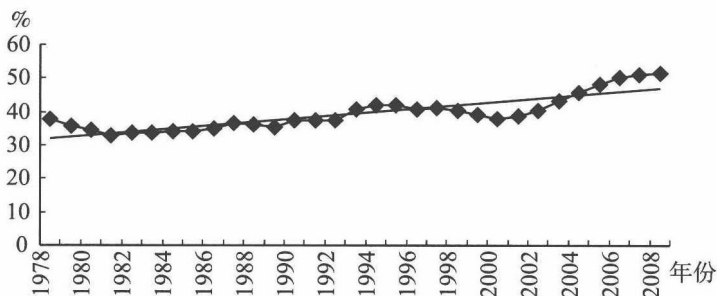


图1-2 1978~2009年国民储蓄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

人口结构决定了储蓄率变动的方向，但真正决定高储蓄率水平的还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根据我院投资研究所

^① 总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0~14岁少儿人口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